

台灣選民的議題取向投票

——二屆國大選民的分析

游 盈 隆*

「議題取向的投票」向來是當代投票行為研究的重心之一。這項研究主題在一九七零年代以後更備受重視，相關的著作有如雨後春筍，充分顯示是一個活力充沛、歷久彌新的研究領域。儘管如此，在台灣，這類研究卻始終停留在起步階段。相關的論文或研究報告屈指可數。而且，所有已出版或未出版的論著，截至目前為止，都只限於地區性的分析；以全國性樣本為基礎的研究仍未曾見。此外，國內僅存極少數這方面文獻在舉凡概念化、運作化、及測量上皆問題重重，遑論整體理論的建構。本文作者以為，「美國選民」一書的諸作者Campbell等人在概念化工作上的努力，已在根本上解決了許多運作化和測量上的難題。在這個基礎上，作者試圖發展出測量台灣選民「議題取向投票」的有效工具。

本文的中心問題是：「二屆國大選民的議題立場和其投票抉擇間的關係強度究竟怎樣？」要較圓滿地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解決以下幾個彼此關係密切的問題。第一，有多少二屆國大選民認知到當時的六大熱門議題？第二，有多少人在六大議題上持有立場並帶有強烈的關懷？第三，又有多少人能認知到不同政黨及所選候選人在六大議題上的立場？最後，選民的議題立場，相對於其他重要解釋變項而言，和投票抉擇間的關係強度究竟怎樣？

* 本文作者係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專任副教授。

謝辭：作者在此謹向台大胡佛教授表達出自內心的最大謝意。若沒有他多年來卓越的領導和堅毅不拔的精神，在嚴寒的政治及學術氣候下，不辭辛勞地耕耘台灣這塊政治學園地，台灣選舉研究絕不可能有今天如此蓬勃之局面。飲水思源，他值得所有曾受其悉心教誨的選舉研究者致上最崇高的敬意，尤其是我個人。作者也願向所有參與台大二屆國大選研究工作者表示感謝之意。對於長期贊助選舉研究的國科會，在此也一併致謝。

東吳政治學報／民國八十三年／第三期／頁219-254。

經驗研究的主要發現如下。第一，二屆國大選舉的主要議題絕大多數可視之為「簡單的議題」。絕大多數選民在選前就已知悉這些問題的存在，因為這些問題從統獨問題開始個個都是臺灣政治上最敏感、最尖銳的問題。第二，高比例的二屆國大選民不但能認知到選舉議題的存在，同時也大都能對所關心的議題採取某種立場。更值得注意的是，高達三成至四成的選民對六項重大議題皆表現出強烈的關心。換言之，二屆國大選民中存在為數可觀的、潛在的議題取向選民。第三，二屆國大選民在區辨不同政黨及候選人議題立場的能力方面令人印象深刻，顯示二屆國大選民心理涉入政治之深。惟一般說來，選民對政黨議題立場認識程度遠超過對自己所選候選人議題立場的認知。假如我們以候選人而非政黨為準，來判斷二屆國大選民中到底可能有多少屬議題取向的選民，我們或許可大膽地說：就是從四成六五到兩成四，隨著議題的不同而變化。這項數字明顯高於一九五零年代的美國選民——從百分之十八到百分之三十六。第四，洛基迴歸分析結果顯示，二屆國大選舉是政黨認同和政黨形象因素主宰選局的一次選舉。這項發現強有力地推翻了民進黨二屆國大選舉係輸在「台獨黨綱」上的說法。的確，從現有的證據看，選舉議題在二屆國大選舉過程中，以及形塑選舉結果上，發揮了醒目但非關鍵性的作用。最後，假如說二屆國大選民中存在有高比例的「議題大眾」或「政策導向的選民」的話，那麼較可能成為這類選民的人的社會特徵是：年輕、高學歷、家庭經濟狀況良好、有政黨認同的男性選民。

總的來說，基於對台灣選舉多年來的觀察與了解，我們認為二屆國大選民對選舉議題認識之深、反應之強，對兩主要政黨與候選人立場之清楚，以及存在有高比例的「議題大眾」等等現象，皆非偶然或獨特。同樣的現象應該也會表現在立委或更高層次的選舉中。個別選舉的特殊性誠然不能全盤抹煞，但台灣特殊歷史情境與結構性因素卻可能使各種主要選舉所呈現的風貌大同小異。高比例「議題大眾」等現象，很可能就是這類共同特徵之一。

壹、引言

議題取向的投票(Issue Voting)向來是當代投票行為研究的重心之一。直到目前為止，西方有關這方面的文獻不但早已汗牛充棟，而且有持續增多的趨

勢。要想精簡地描述此大量文獻的內容，確非易事。方便起見，我將依據時序以及研究的方向和重點，對既存的文獻做提綱挈領式的歸納和整理，盼能對這方面的研究提供一初步但稍具全貌性的了解。

研究議題取向投票的第一階段，大約可涵蓋一九四〇到一九六〇年代。在這段時期，Lazarsfeld與Berelson等人所代表的社會學途徑的研究即不敢忽視選民的議題立場及投票傾向，儘管他們的研究發現並沒證實選民投票深受議題立場的影響(Lazarsfeld, Berelson, and Gaudet, 1944; Berelson, Lazarsfeld, and McPhee, 1948)。對當代議題取向投票研究影響最深遠者，無疑是興起於一九五〇年代的「密須根學派」。此學派為議題取向投票的研究奠定了概念及理論的基礎，從此也相當程度地左右了往後三十年研究的走向。然而，早期密須根學派的研究卻發現選民議題立場對其投票的影響並不強(Campbell, Gurin and Miller, 1954; Campbell, Converse, Miller and Stokes, 1960)。這樣的結論自然無形中轉移了研究者的興趣，其影響至少持續達十年以上。當密須根學派將選舉議題的影響力微弱歸因於選民無知、缺乏理性的時候，代表另一重要知識傳統的理性抉擇論者卻提出極為不同的觀點。Anthony Downs (1957)即認為，選舉議題能否對投票發生影響力須視政黨與候選人的選戰策略而定。尤其在兩黨制下，政黨與候選人為爭取最多選票起見，很可能不約而同地採取溫和的意識型態立場，導致選民難以區辨二者的主張。如因此而減弱議題的影響力，則問題是在於政黨與候選人，而非選民身上。Downs所代表的理性抉擇觀點在一九五〇年代異軍突起，後起之秀遵循演繹的方法建構空間模型(Spatial Model)，與密須根學派分庭抗禮，歷久不衰(Riker, 1968; Davis, Hinich and Ordeshook, 1970)。

第二階段，約略涵蓋整個一九七〇年代，新興的觀點被貼上修正主義的標籤。此新觀點的倡導者之所以被冠上修正主義者(Revisionists)的稱號，係因他們挑戰早期密須根學派所形塑的美國選民形象。研究民意與選舉的傑出政治學者V. O. Key (1966)率先發難，他強調「選民絕非笨蛋」，有事實足資證明一般選民常回顧評估政府的施政表現，並作為投票的參考。David RePass (1971)則使用不同測量方法所得的資料，極力辯稱選民不但熟知重大議題，同

時也清楚政黨立場的差異。不過，RePass的立論卻也招致另一位學者強烈的批判，認為其並不了解Campbell等人為議題取向投票所設的要件為何物(Margolis, 1977)。此外，Nie, Verba和Petrocik (1976)指出，經歷了一九六〇年代中期以來的政治社會變遷，由於新選民和新議題的出現，選舉議題對選民投票的影響力已大為增強。Miller與Levitin (1976)則指出，一九六〇年代以後政黨與候選人表現已迥異於往昔；換言之，政黨與候選人已比以往更勇於表明自己的政策立場，這想必有助於提升選舉議題的影響力。修正論者的相關論述甚多，篇幅所限在此只能列舉其中之一小部份。(註一)

第三階段，主要是一九八〇年代迄今這段時間，其中要數Fiorina (1981)的著作，力倡回顧性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理論，最具影響力。他結合Anthony Downs理論抉擇觀點和V. O. Key的回顧性施政表現評估的論點，形成一個極具說服力的論證，也為議題取向投票注入新的內涵。除此之外，八十年代學界興起一股研究經濟因素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的熱潮。就性質而言，這類研究是屬於「回顧性投票」的一種，同時也可能是研究比例最高的一種。研究者或使用總體資料試圖建立總統經濟政策表現與選舉結果之關係(Tufte, 1975; Hibbs, 1982; Kramer, 1983)，或使用個人層次(Individual-level)資料試圖探尋個人對國家經濟現況的態度與投票行為的關係(Kinder and Kiewiet, 1979, 1981; Feldman, 1982; Lewis-Beck and Lockerbie, 1989)。大多數歐美這類研究皆肯定經濟因素對選舉結果或個人投票行為的影響，但也有一些研究結果持否定的看法(Niemi and Weisberg, 1993)。

除開上述這些文獻之外，尚有不少理論上重要的研究亦值得一提。首先是Carmines及Stimson (1980)在研究美國選民投票行為時，發現議題取向的投票其實可根據議題的性質再區分成兩種。其中一種議題可稱之為「高難度議題」(Hard Issue)，另一種議題可稱為「簡單的議題」(Easy Issue)。「高難度議題」之所以難，是因為選民面對這類議題，必須投入較高的「資訊成本」(Informa-

註一：John Kessel. 1972. "The Issues in Issue Voting," *APSR* 66: 459-465.其注釋1詳列了這時期這一方面的重要文獻，值得讀者參閱。

tion Cost)才得以分辨政黨與候選人究係採何種立場，以決定自己究應做何種選擇。至於「簡單的議題」之所以簡單，是因為所指的議題是那些選民連想都不用想就可判斷那些政黨或候選人會採取那種立場。這種針對議題性質所做的概念上的釐清相當要緊，它不但關係到理論的建構，也涉及對選民投票行為意義的正確詮釋。

其次，當經濟因素與選舉結果的研究正熱的時候，有不少政治心理學者起而強烈反駁「自利的(Self-interest)動機是決定選民投票的重要因素」的說法(Sears, Lau, Tyler and Allen, 1980; Conover and Feldman, 1984)。Sears等人的研究發現，具有強烈政治象徵意義的態度(Symbolic Attitudes)，如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的意識型態、政黨認同、種族偏見等等，對選民政策偏好或投票行為的影響要遠超過短期的經濟利益考量。最後，Rabinowitz和Macdonald (1989)建構方向理論(A Directional Theory of Issue Voting)為議題取向投票的理論性研究邁出新的第一步。這兩位學者的實徵研究支持了他們的論證，亦即理性抉擇途徑所衍生的「空間模型」文獻過度強調「趨近理論」(Proximity theory)是不適當的，因為選民對候選人的選擇不僅僅只顧及主張上的差距大小，更重要的是意識型態立場是否一致。Rabinowitz和Macdonald對空間模型的理論上修正無疑是重大的，值得我們注意。

如上所述，議題取向的投票不但在傳統投票行為研究上舉足輕重，而且在一九七〇年代以後更備受重視，相關的著作有如雨後春筍，充分顯示是一個活力充沛、歷久彌新的研究領域。但我們接著應該問的是，為什麼「議題取向的投票」如此受重視？原因一定不少，但主要的應可歸納成兩方面的因素：一是實用的(Pragmatic)目的，另一是規範性的(Normative)目的。所謂實用的目的，指的是研究者希望透過這類的研究，能夠掌握一個社會政治衝突的本質、政治菁英的策略性思考與行動、選舉議題對選民抉擇的影響程度，進而能有助於了解選舉結果和政黨體系的形成與轉變。是以Carmines及Stimson在其名著「議題的演化」(1989: 3)一書中開宗明義地說：談政治就是談議題，這幾乎是不變的道理。」而所謂規範性目的，指的是在經驗知識的基礎上去反省代議民主政治的基本問題，例如選民的政治理性、責任政黨政治、民意與

公共政策等等問題(Page, 1978: 102-107)。

以上我們嘗試簡略地說明近半世紀西方議題取向投票研究的沿革及其重要性。顯然地，議題取向的投票是一個重要的研究題材，尤其對一個享有充分自由且政黨競爭激烈的民主國家而言更是如此。但是有一點必須強調的是，選舉議題對選民投票的影響力不是一成不變的，許多主客觀因素的存在會決定其影響程度。Flanagan等五位「日本選民」(1992)一書的作者即指出：選舉議題對選民決策的影響很可能隨著國家的不同而不同，選舉的不同而不同，甚至研究的不同而不同。」^(註二)所謂隨著國家的不同而不同，主要是指國家所面臨政治社會衝突性質之不同，而較非指國家實施民主政治時間長短之不同；此外，所謂隨著選舉的不同而不同，我的看法是主要須視當時政治環境的特質，以及政黨與候選人的策略性選擇而定；各國選民的政治取向即令有所不同，但一般而言在性質上其畢竟屬長期因素，不易被任意操控，因此也較不可能在短期內隨著選舉的不同而有差異。最後，所謂隨著研究的不同而不同，這很可能係肇因於概念上、運作上以及測量方法上的不同或良窳，假定各調查研究的樣本精確性相等的話。的確，即以國內近十餘年來蓬勃發展的投票行為研究而言，研究者間對於選舉議題對台灣選民投票的影響力評估就有很大的差距（陳義彥，1986; 1991）。仔細推敲箇中原委，多半與概念上、運作上以及測量方法上的不同或良窳有關。因此，若欲探討台灣選民的議題取向，一個適當且必要的起點乃是針對既存的文獻做批判性、建設性地回顧與檢討。這正是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

貳、問題的釐清

嚴格說來，國內正式出版的有關議題取向投票的論文只有三篇，未出版但涉及這項主題的論文或研究報告也屈指可數。^(註三)而且所有已出版或未出

註 二：請參見Scott C. Flanagan, Shinsaku Kohei, Ichiro Miyake, Bradley M. Richardson, and Joji Watanuki. 1991. The Japanese Vot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 267.

版的論著都只限於地區性的分析；胡佛的研究對象是台北市選民，而陳義彥的研究對象先後分別是台南縣和台北縣選民。換言之，截至目前為止，尚無奠基在全國性樣本的有關選民議題取向投票的論文出現。

就研究方法而言，早期台大選舉研究小組在胡佛教授領導下，主要成員包括陳德禹、朱志宏等先生，對選民投票取向的測量方式基本上採取直截了當的問法。也就是在結構性問卷題目的基礎上，讓選民自我陳述其投票主要考慮的因素是什麼，這其中就包括了政黨、政見以及候選人特質等等，林林總總不下三十項。研究者再據以統計歸納出選民的各種投票取向。這種測量方式若以美國主流的、投票行為研究的尺度去衡量的話，自然是粗糙不堪的。但我們不應忘記，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台大的選舉研究所象徵的正是台灣投票行為研究的開端，因此不論是理論或方法，事後看來顯得粗枝大葉，卻一點都不令人震驚。較難能可貴的是，在胡佛教授的領導下，台大選舉研究小組在既有的基礎上，不斷反省檢討，努力想提升理論與方法論的水平，以趕上歐美的研究水準。即以議題取向的投票而言，在理論與測量方法上已經和美國主流的投票行為文獻銜接起來，這一點我在後面會做更進一步的交代。

除了早期台大選舉研究小組的努力外，陳義彥教授個人在政大苦心經營多年，後來更結合一批較年輕學者致力於投票行為研究，也是功不可沒。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九八〇年代後期的台灣政治學界只有陳先生一人在大聲疾呼，批判台大及其他研究者對議題取向的測量方法不當，並試圖發展出另一套較適切的測量方法（陳義彥，1986; 1991）。可惜的是，他在Angus Campbell等人的概念基礎上所發展出的測量工具，一來始終侷限在地方選舉研究上，

註三：已出版的三篇論文如下：(1)胡佛，1982，載《近代中國的變遷與發展》。台北：時報出版公司。頁117-195；(2)胡佛、游盈隆，1983，「選民的投票取向：結構與類型的分析」，政治學報，第十一期；(3)陳義彥、黃麗秋，1986，「選民政見取向的再探討」，《投票行為與選舉文化》，中國政治學會編印，頁206-238。此外，屬未出版但較重要者乃，陳義彥，1991，「政見與投票抉擇的關聯性——台北縣縣長選舉的探討」，《台灣地區選民的投票行為——一個理論模式的探索》（未出版），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頁63-97。其他論著參閱陳義彥、黃麗秋(1986)。

二來一直都未能清楚的呈現出選舉議題真正的影響力，尤其是相對於其他重要變數而言。這或許是陳先生的研究結論一貫低估議題影響力的部份原因。

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切入來探討議題取向的投票。假如我們想研究的現象是選民議題取向的投票，那麼我們的中心問題應該是什麼？想適當地回答這個問題，必須涉及問題的三個層次，也就是，概念的、運作的以及測量的層次。在概念的層次上要問的是，何謂「議題取向的投票」(Issue Voting)? Brody and Page (1972)爲此提供了一個清楚的界定，雖然他們換稱之爲「政策投票」(Policy Voting)。「所謂政策投票，是指選民投票行爲所受個人政策偏好影響之程度。」^(註四)顯然在他們看來，議題取向的投票或政策投票乃是個程度問題。至於對「議題取向投票」在概念上的進一步鋪陳，其實可回歸到 Campbell等「美國選民」一書作者們原始的想法。Campbell等人對「議題取向投票」的處理事實上相當審慎和細膩。一九六〇年代以後許多關於「議題取向投票」的論爭其實是多餘的，因爲有不少研究者對「議題取向投票」望文生義、不求甚解，甚至誤解原作者的意思，大打迷糊仗；也因此引起不少學者起而呼籲，希望參與論爭者先弄清楚究竟「美國選民」一書的作者們是怎麼說的(Kessel, 1972; Margolis, 1977)。在國內事實上也有不少研究投票行爲的學者患同樣的毛病，不可不察。

究竟「美國選民」一書的作者們是怎麼說的？其實他們講得很明白，一項議題要影響及個人的投票決策至少須滿足三個要件：

- 第一，選舉議題必須以某種形式被選民認知到；
- 第二，議題必須足以某種程度地燃起選民熾熱的情緒；
- 第三，選民必須知覺到某個政黨相對於其他政黨而言議題立場上和自己比較接近。^(註五)

註 四：請參見Richard A. Brody and Benjamin I. Page. 1972. "Comment: The Assessment of Policy Voting." *APSR* 66. p. 450。

註 五：請參見Angus Campbell,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169-171.

換言之，一項議題要能影響選民投票，最起碼選民必須知道這項議題的存在，且必須感覺這項議題重要並對其具有特定意見；最後，選民必須區辨得出不同政黨間在所關注議題立場上的差異。必須強調的是，這三要件只不過構成「議題取向投票」的必要條件。其既非充分條件，更非充分必要條件。簡單地說，這三條件即使皆存在，也並不保證選民的議題立場鐵定可以影響其投票；但設若這三要件不能同時存在的話，則根本不可能有所謂「議題取向的投票」。

Campbell等人在概念化工作上的努力，已在根本上解決了許多運作化和測量上的難題。我們即據以發展出測量二屆國大選民「議題取向投票」的工具。的確，一九九一第二屆國大選舉問卷內容，相對於過去十年台大慣常使用的問卷而言，有多方面重大的改變，選舉議題測量方式的改變只是其中之一而已。讓我們舉例說明之。在二屆國大選舉中，總統選舉方式應如何是一個重要的選舉議題，要評估選民對這項議題的態度是否影響及其投票抉擇，我們設計了四道題來加以測量。

首先，我們問受訪者「最近國內各界對選舉總統的方式有很多爭議和討論，有人認為應採取「委任選舉」，也有人認為應開放「直接民選」。請問您有沒有聽過這方面的爭議？」很顯然地，這道題的作用是在測受訪者是否認知到這項選舉議題的存在。其次，我們接著問「在這些爭論中，有些人認為應採取「委任選舉」，也有人認為應開放「直接民選」。請問您個人的看法是什麼？受訪者可以有五種選擇：(1)委任選舉；(2)直接選舉；(3)無所謂；(4)不知道；(5)其他。假如受訪者答(1)或(2)，那麼就追問其究係很堅持或贊成但不很堅持？」這道題的作用有二。一方面在測受訪者是否對這項議題有特定看法，另一方面則在測受訪者對這項議題在乎的程度。換言之，一是測偏好的方向，另一則是測偏好的強度。第三，我們問「請問就您所知，國內兩個主要政黨（國民黨和民進黨）對這項問題的立場是什麼？」。最後，我們問「請問就您所知，這次您所選的國大代表候選人對這項問題的立場是什麼？」明顯地，最後這兩道題的目的是，測受訪者是否能區辨不同政黨及候選人議題立場的差異。

以上就是我們將抽象的「議題取向投票」的概念轉化成可觀察的經驗現象的方法。除了總統選舉方式問題之外，我們還針對了另外五項重要選舉議題分別加以測量，並且採用同一套格式如上所顯示的。我們覺得這樣的全新設計，應大大有助於我們處理全國性選民議題取向投票的相關問題。而衡諸國內貧乏的議題取向投票文獻，這也正是破天荒第一遭在結合理論、方法及經驗資料基礎上所做的大膽嘗試。的確，概念釐清的工作做得再好，若測量不當、資料無法配合，也是枉然(Kessel, 1972)。

整體來說，本文的中心問題是：二屆國大選民的議題立場和其投票抉擇間的關係強度究竟怎樣？要較圓滿地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解決以下幾個彼此關係密切的問題。第一，有多少二屆國大選民認知到當時的六大熱門議題？第二，有多少人在六大議題上持有立場並帶有強烈的關懷？第三，又有多少人能認知到不同政黨及所選候選人在六大議題上的立場？最後，選民的議題立場，相對於其他重要解釋變項而言，和投票抉擇間的關係強度究竟怎樣？在以下的篇幅中，我們將回答上述這些問題，並嘗試做適當的詮釋。

參、議題取向投票的要件

相對於過去任何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二屆國大選舉可說是一次相當奇特的選舉。由於二屆國大的產生象徵老法統的終結，而二屆國代又身受選民之付託，肩負有修憲或制憲的重責大任。但不論是修憲也罷，制憲也罷，二屆國大的主要工作涉及政治體系基本遊戲規則的修改或重建，其影響之深遠自不待言。正因如此，二屆國大選舉便成為台灣解嚴後朝野兩黨的另一場關鍵性戰役。選舉議題之豐富無疑是二屆國大選舉的最重要特色之一。舉凡統獨問題、總統選舉方式問題、重返聯合國問題、海外黑名單問題、制憲或修憲問題、公民投票問題、以至中央政府體制問題等等，幾無一不是臺灣存在已久的重大政治問題，在這次選舉中竟悉數浮出檯面，由此亦可見此次選舉的特殊性。

國內政治氣氛空前凝重，社會人心不安，是二屆國大選舉的另一項特色。

引爆點則是民進黨在那年(1991)秋天全國黨代表大會通過俗稱的「臺獨黨綱」。執政的國民黨借題發揮，聲色俱厲地威脅要依法解散甫成立四年的民進黨。在做法上，則兵分兩路，一路循正式制度的管道，亦即經由內政部政黨審議委員會研商如何議處民進黨；另一路則是發動大眾傳播媒體，尤其是電視、電臺等電子媒體，進行強力的文宣攻勢，全面批判、圍剿民進黨的臺獨主張，試圖激發民眾的不安全感與不滿民進黨的情緒。國民黨當時氣焰高張且來勢洶洶，似乎頗有想藉機一舉摧毀新興反對黨的打算。的確，二屆國大選舉前那種一觸即發的詭譎氣氛是臺灣一九八七以後難得一見的。若就選戰氣氛的營造以有利於己方勝選而言，國民黨顯然是成功的。二屆國大選民是否感受到那種緊張的態勢，因而強化對選舉議題的關心，進而影響最後投票的決定？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一、**選舉議題的顯著性**。讓我們從一個簡單的問題開始，有多少二屆國大選民認知到當時的六大熱門議題？也就是統獨問題、總統選舉方式問題、重返聯合國問題、海外黑名單問題、制憲或修憲問題、以及中央政府體制問題。這個問題也正是我們前述一系列有關議題取向投票的問題中的頭一個問題。表一提供了這項問題的答案。

表一：二屆國大選舉議題的顯著性

1. 統獨問題	74.8
2. 總統選舉方式	70.3
3. 憲政改造方式	63.4
4. 進入聯合國方式	62.5
5. 黑名單問題	60.0
6. 中央政府體制問題	43.3

N = 1384

根據表一，我們可以看出二屆國大選民普遍能認知到當時主要的選舉議題。最高從統獨問題的百分之七十五到最低的中央政府體制問題的百分之四十三。事實上，有六成以上的選民能認知到六大議題中的五個議題的存在。這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發現。為什麼二屆國大選民中有如此高比例的人能知曉國內重大的政治問題？二屆國大選前的統獨紛爭，以及政黨和候選人在選舉過程中強力文宣攻勢自然皆是可能的原因。但這都只能算是短期選舉因素。既然是屬選舉的短期因素，則一般說來應不足以在短短時間內造成六成以上選民皆能認知到那麼多項議題的存在。因此，我們認為這很可能跟這些議題的性質有關。的確，若照Carmines和Stimson的分類，表一所列的問題幾乎皆屬「簡單的議題」。根據他們的研究，「簡單的議題」通常具有下列三個特質：

- (1)它是具有象徵意義的，而非純技術性的；
- (2)它大都涉及政策目標，而較非政策手段和細節；
- (3)它較可能是些已公開論辯多時卻遲遲未能解決的公共議題。（註六）

依照這些標準，二屆國大選舉的主要議題絕大多數可視之為「簡單的議題」。絕大多數選民很可能在選前就已知悉這些問題的存在，因為這些問題從統獨問題開始個個都是臺灣政治上最敏感、最根本的問題。在過去嚴厲的戒嚴統治時期，這些問題是政治的禁忌，除了少數反對運動領袖和知識份子敢干冒大不諱向當局挑戰之外，人民不敢公開談論，深怕惹禍上身，但內心其實早已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存在，並暗中注意這些問題的發展。一但政治自由化之後，言論思想的風險降低，當有更多的政治人物更勇於向禁忌挑戰時，大眾對現實政治的諸多疑慮與焦慮一時之間被解放出來，高比例選民知道主要選舉議題為何只不過是這整體現象的表徵之一而已。然而，眾多選民知曉重要

註 六：請參見Edward G. Carmines and James A. Stimson. 1980. "The Two Faces of Issue Voting," *APSR* 74: p. 80.

選舉議題的存在是否也意味著他（她）們打從內心關懷這些問題的解決？這正是我們下一步要回答的問題。

二、選民關心選舉議題的程度。純就運作的意義而言，是否關切問題的解決可具體表現在兩方面。首先是對個人所關切議題持有的立場，再次是對所持立場堅持的程度。從這兩方面可看出選民關心選舉議題的程度。而這同時也是選民議題取向投票的必要條件之一。表二之一到二之七具體地回答了這個重要問題。

表二之一：二屆國大選民對統獨問題的態度立場*

中國統一 V. 台灣獨立	百分比
1. 很堅持建立「台灣共和國」	3.64
2. 贊成但不很堅持建立「台灣共和國」	6.71
3. 維持現狀（不統不獨）	23.58
4. 贊成但不很堅持台灣與大陸統一	23.39
5. 很堅持台灣與大陸統一	29.05
6. 無所謂	3.55
7. 不知道／其他	9.97

N = 1043 *只限對此議題有認知者

表二之一呈現的是，二屆國大選民對統獨問題的態度立場。從偏好的方向看，對此議題有認知者當中，贊成臺灣獨立的選民佔有百分之十左右；贊成維持現狀，不統不獨者則佔有約百分之二十四；贊成臺灣與大陸統一者佔有約百分之五十二；此外，認為無所謂者有百分之四左右；知道此問題但不知採取何種立場者，以及持有其他想法者合佔一成左右。從偏好強度看，很

堅持臺灣獨立者約有百分之四，惟很堅持中國統一者佔有三成左右，二者合計則對統獨問題具強烈立場者可能達二屆國大選民的三分之一。另須指出的是，這項估計尚不包括那些很堅持不統不獨者在內，這類人合理估計當不下於百分之十。果真如此，那二屆國大選民中對統獨問題具強烈立場者鐵定超過百分之四十。就算不考慮其他百分之三十持溫和立場者，即以四成以上具強烈立場選民的存在，難道還能說臺灣選民只關心所謂公共政策問題，對臺灣前途這種高層次問題反而漠不關心嗎？經驗性證據已提供了明確的答案。

表二之二：二屆國大選民對總統選舉方式的態度立場*

委任直選 V. 直接民選	百分比
1. 很堅持「委任選舉」	12.86
2. 贊成但不很堅持「委任選舉」	24.29
3. 贊成但不很堅持「直接民選」	26.63
4. 很堅持「直接民選」	18.78
5. 無所謂	8.47
6. 不知道／其他	8.78

N = 980 *只限對此議題有認知者

表二之二呈現的是，二屆國大選民對總統選舉方式的態度立場。從偏好的方向看，對此議題有認知者當中，贊成「委任選舉」的選民有百分之三十七左右；贊成「直接民選」者約有百分之四十五；此外，認為兩者皆可的有百分之八左右；知道此問題但不知採取何種立場者，以及持有其他想法者合佔近一成左右。從偏好強度看，很堅持「委任選舉」者約有百分之十三，而很堅持「直接民選」者佔有近兩成左右，二者合計則對總統選舉方式具強烈立場者可能佔二屆國大選民的三分之一弱。假如再考慮有五成左右選民對這

項議題持較溫和立場的話，那二屆國大選民無疑是十分關切未來總統應如何選。從統計數字看，二屆國大選民顯然較偏愛未來總統由公民直選，惟反對的聲音也不算小。

表二之三呈現的是，二屆國大選民對憲政改造方式的態度立場。從偏好的方向看，對此議題有認知者當中，贊成「修憲就符合當前的需要」的選民高達百分之六十七左右；贊成「制憲才能解決當前的問題」者只有百分之十二；此外，感覺制憲或修憲皆可者有百分之六左右；知道此問題但不知採取何種立場者，以及持有其他想法者合佔百分之十四左右。從偏好的強度看，很堅持「修憲」者約有三成左右，而很堅持「制憲」者佔有百分之五，二者合計則對憲政改造方式具強烈立場者可能佔二屆國大選民的三分之一強。假如再考慮有四成半左右選民對這項議題持較溫和立場的話，那二屆國大選民顯然是十分關切台灣的憲改問題。從統計數字看，二屆國大選民強烈偏愛以修憲方式來達成憲政的改造；相對之下，主張制憲的選民顯然是屬弱勢的一方。

表二之三：二屆國大選民對憲政改造方式的態度立場*

修憲 V. 制憲	百分比
1. 很堅持「修憲」	30.43
2. 贊成但不很堅持「修憲」	37.10
3. 贊成但不很堅持「制憲」	6.90
4. 很堅持「制憲」	5.32
5. 無所謂	6.33
6. 不知道／其他	13.69

N = 884 *只限對此議題有認知者

表二之四呈現的是，二屆國大選民對進入聯合國方式的態度立場。從偏好的方向看，對此議題有認知者當中，贊成以「以中華民國名義」重返聯合國的選民有百分之五十五左右；贊成「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者只有百分之十二；此外，覺得用何種名義加入聯合國無所謂者有百分之十四左右；知道此問題但不知採取何種立場者，以及持有其他想法者合佔幾近兩成之多。從偏好的強度看，很堅持「以中華民國名義」重返聯合國者約近三成左右，而很堅持「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者佔有百分之三，二者合計則對進入聯合國方式具強烈立場者約佔二屆國大選民得三成左右。假如再考慮有三成半左右選民對這項議題持較溫和立場的話，那二屆國大選民顯然是非常關心台灣能否重返聯合國。從統計數字看，二屆國大選民強烈偏愛「以中華民國名義」重返聯合國；相對之下，主張「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者屬少數的一群。

表二之四：二屆國大選民對進入聯合國方式的態度立場*

中華民國名義 V. 台灣名義	百分比
1. 很堅持使用「中華民國名義」	27.84
2. 贊成但不很堅持「中華民國名義」	27.84
3. 贊成但不很堅持「台灣名義」	8.13
4. 很堅持「台灣名義」	3.09
5. 無所謂	13.63
6. 不知道／其他	19.24

N = 873 *只限對此議題有認知者

表二之五呈現的是，二屆國大選民對海外「黑名單問題」的態度立場。

從偏好的方向看，對此議題有認知者當中，贊成「維持管制」的選民有將近五成；贊成「廢除黑名單」者約有三成五左右；此外，對究竟應繼續維持管制或應予廢除不置否可者，只有百分之三點五；知道此問題但不知採取何種立場者，以及持有其他想法者合佔百分之十二。從偏好的強度看，很堅持「維持管制」者約有百分之二十三，而很堅持「廢除黑名單」者佔有百分之十五，二者合計則對總統選舉方式具強烈立場者佔二屆國大選民的近五分之一。假如再考慮有將近五成的選民對這項議題持較溫和立場的話，那二屆國大選民無疑也是十分關切如何解決海外黑名單問題。從統計數字看，二屆國大選民顯然較偏向繼續維持管制，但主張廢除的聲浪也很強勁，忽視不得。

表二之五：二屆國大選民對黑名單問題的態度立場*

維持管制	V. 廢除黑名單	百分比
1. 很堅持「維持管制」		23.23
2. 贊成但不很堅持「維持管制」		25.66
3. 贊成但不很堅持「廢除黑名單」		20.72
4. 很堅持「廢除黑名單」		14.61
5. 無所謂		3.47
6. 不知道／其他		12.09

N = 835 *只限對此議題有認知者

表二之六呈現的是，二屆國大選民中央政府體制的態度立場。從偏好的方向看，對此議題有認知者當中，贊成中央政府體制維持五權分立的選民有將近五成的比例；贊成將中央政府體制改成三權分立者，亦有兩成左右；此外，對中央政府體制究應採三權分立或五權分立覺得無所謂者，有一成左右；知道這項問題的存在但不知採取何種立場者，以及持有其他想法者合佔幾近

兩成之多。從偏好的強度看，很堅持維持五權分立的政府體制者約近兩成左右，而很堅持將中央政府體制改成三權分立者也有將近一成的比例，二者合計則對中央政府體制具強烈立場者約佔二屆國大選民的三成左右。假如再考慮有四成左右選民對這項議題持較溫和立場的話，那二屆國大選民顯然是非常關心中央政府體制變更的問題。從統計數字看，二屆國大選民仍強烈傾向維持既存的政府體制，但主張從根本上改變現行政府體制者也有相當的比例，而這也將構成往後要求變更五權體制政府的重要原動力。

表二之六：二屆國大選民對中央政府體制的態度立場*

五權分立 V. 三權分立	百分比
1. 很堅持「五權分立」	20.29
2. 贊成但不很堅持「五權分立」	28.50
3. 贊成但不很堅持「三權分立」	12.24
4. 很堅持「三權分立」	8.53
5. 無所謂	10.15
6. 不知道／其他	19.97

N = 621 *只限對此議題有認知者

以上我們具體呈現了二屆國大選民對當時主要選舉議題的關心程度。這些客觀的經驗數據顯示了高比例的二屆國大選民不但能認知到選舉議題的存在，同時也大都能對所關心的議題採取某種立場。也許更重要的是，在上述六項議題上，表示強烈關心的選民比例竟高達三成至四成。^(註七)這一切都支持說二屆國大選民不但不是政治冷漠的選民，而且是高度關心政治的潛在的

註 七：關於選民對這些主要選舉議題立場的分佈及其所透露出民意的趨向與結構，讀者可參閱拙作「當前台灣民意的特質與結構—二屆國大選民的分析」(1993)，《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資料運用》學術研討會，中研院社科所與國科會合辦，南港，台北。1993年3月15—17日。

議題取向的選民。

三、選民區辨政黨及候選人議題立場的能力。在二屆國大選民中有多少人能認知到不同政黨及所選候選人在六大議題上的立場？這是議題取向投票的必要條件之一，也是這一節要討論的。表三之一到二提供了具體的答案。

表三之一所顯示的是二屆國大選民對國民黨與民進黨在六大議題立場的認知程度。從表中可明顯看出選民對兩黨議題立場的認知程度依序是：統獨問題、總統選舉方式問題、重返聯合國問題、制憲或修憲問題、海外黑名單問題、以及中央政府體制問題。更進一步說，有六成以上選民能清楚認識到國民黨與民進黨在統獨問題上的立場；有超過五成以上的選民能清楚知道兩黨主張用何種方式選舉總統（國民黨主張委任選舉，而民進黨主張公民直選）；在其他三議題方面如重返聯合國、制憲或修憲、海外黑名單等問題，清楚知道兩黨立場的選民從最低四成五到最高五成一不等，再次顯示二屆國大選民心理涉入政治之深。不過，與前五個問題比較起來，兩黨在中央政府體制問題上的立場是較不為人所熟知的。正確認識國民黨在這項問題上的主張者只有三成，而能正確認識民進黨在這項問題上的主張者，更只有四分之一左右的選民。

表三之一：選民對國民黨／民進黨議題立場的認知程度*（%）

主要選舉議題	國民黨	民進黨
1. 統獨問題	63.0	61.9
2. 總統選舉方式	52.8	55.0
3. 進入聯合國方式	50.8	49.3
4. 憲政改造方式	49.1	47.3
5. 黑名單問題	45.8	47.2
6. 中央政府體制問題	30.1	24.6

N = 1384 *只限對此議題有認知者

表三之二所呈現的是，二屆國大選民對所選候選人議題立場的認知程度。和表三之一做比較可發現，一般選民對政黨議題立場認識程度遠超過對候選人議題立場的認知。這就是說，有為數可觀的選民知道自己所選候選人所屬政黨的議題立場，但卻不知自己所選候選人所持的議題立場為何。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值得未來做進一步的研析。具體地說，二屆國大選民對所選候選人議題立場的認知程度，從最高的四成六五到最低的兩成四，隨著議題的不同而變化。再度地，統獨問題仍高居第一，總統選舉方式其次，中央政府體制問題殿後。假如我們以候選人而非政黨為準，來判斷二屆國大選民中到底可能有多少屬議題取向的選民，我們或許可大膽地說：就是從四成六五到兩成四，隨著議題的不同而變化。這項數字明顯高於一九五〇年代的美國選民——從百分之十八到百分之三十六，隨著議題的不同而變化(Margolis, 1977: 31)。

表三之二：二屆國大選民對所選候選人議題立場的認知程度

主要選舉議題	認知程度
1. 統獨問題	46.5
2. 總統選舉方式	44.0
3. 進入聯合國方式	41.7
4. 憲政改造方式	37.2
5. 黑名單問題	32.2
6. 中央政府體制問題	24.0

N = 1384

肆、選舉議題的影響力

上述的分析已為我們提供一個探討二屆國大選民議題取向投票較堅實的基礎。但我們不應只停留在問「有多少選民是議題取向的選民？」或「選舉議題是否對投票具有影響力」？Nieme與Weisberg (1993: 138)已指出「當代議題取向投票的文獻所關切的已非選舉議題是否具影響力，而是那些議題具影響力，且它們如何發揮影響力。」當然，這兩位學者所指的乃美國的研究現況，我們不必被他們牽著鼻子走，畢竟台灣的議題取向投票的研究才剛起步，許多關於議題選民的基本問題仍亟須被探究。換言之，台灣現階段議題取向投票的研究不但一方面要問：有多少選民是議題取向的選民？選舉議題是否對投票具有影響力？以及誰可能是議題取向的選民？等等問題；另一方面，我們也應進一步問：那些選舉議題在台灣的選舉中具有影響力？選民的議題立場，相對於其他重要解釋變項而言，和投票抉擇間的關係強度究竟怎樣？回答後面這兩個問題是本節的主要目的。

表四所呈現的是兩個洛基迴歸模型(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相依變數是「選民的投票抉擇」，此變數包含兩個值，一是國民黨，另一是民進黨。讓我們先看第一個模型。此模型包含有三類共十四項解釋變數。第一類變數是關於選民對政黨的態度；我們取政黨認同和政黨形象這兩個強有力變數。^(註八)第二類是選舉議題變數共七項，包括統獨問題、總統選舉方式問題、重返聯合國問題、制憲或修憲問題、海外黑名單問題、中央政府體制問題以及公民投票問題。第三類是社會背景變數，包括性別、年齡、族群背景、教育程度和家庭經濟狀況等五項。採洛基迴歸分析的主要用意有二：(1)可觀察七個選舉議題對選民投票抉擇的相對影響力；(2)可以比較選舉議題和其他種變數對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程度。洛基迴歸模型是一種犀利的分析工具，但我

註 八：政黨形象是解釋二屆國大選民政治態度和選舉行為的重要變數，讀者可參閱拙著「政黨形象、意識型態與台灣選舉變遷」(1993)，《政黨競爭與台灣民主化》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主辦，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一日，南港，台北。

們在此僅擬用來凸顯不同變數對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力。

表四模型一顯示了什麼？綜合來說，有四點重要發現：(1)在所有解釋變項中，以政黨認同對二屆國大選民的投票抉擇最具影響力；(2)在影響二屆國大選民投票抉擇上，政黨形象是僅次於政黨認同的最重要變數；(3)在所有選舉議題變數中，只有總統選舉方式這一項對二屆國大選民的投票抉擇具有顯著的影響力，同時它也是僅次於政黨認同和政黨形象的第三重要的解釋變數；(4)在控制其他重要政治心理變數的條件下，所有社會背景變數對選民的投票抉擇一概無顯著的影響，這包括最常被提及的族群背景變數在內。此外，表四模型一也做了適合度檢定，以正確預測百分比達八十四點五來說，顯示整個模型與資料間有緊密的契合，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好模型。

表四模型二又說明了什麼？在這個模型中，原先十四個變數中已去除了八項，主要是因為其對選民投票抉擇缺乏解釋力；而「逐步洛基迴歸分析」(Stepwise Logistic Regression)顯示，除了政黨認同、政黨形象及總統選舉方式外，尚有海外黑名單問題和教育程度這兩變數對選民投票抉擇具有顯著影響力。相對地，族群背景或省籍變數在控制其他五項重要政治心理變數的條件下，對選民投票抉擇仍無顯著影響力。比較表四兩模型，我們發現去除八個變數後，模型二增加八個自由度，正確預測百分比仍同維持八十四點五，可見這是一個較佳的模型。

整體來說，洛基迴歸分析結果顯示，二屆國大選舉是政黨認同和政黨形象因素主宰選局的一次選舉。從選舉過程看，這次選舉的確是議題多且重要，同時有充分的證據顯示，二屆國大選民對這些重要選舉議題有相當的認識與關切，但只有總統選舉方式和海外單名單這兩項議題對選民投票發生顯著影響，其他許多重大議題像統獨問題、制憲修憲問題等等竟然對選民投票幾毫無影響力。這項發現强有力的否定了民進黨二屆國大選舉係輸在台獨黨綱上的說法。最後，回到我們原始的問題：選民的議題立場，相對於其他重要解釋變項而言，和投票抉擇間的關係強度究竟如何？」從現有的證據看，選舉議題在二屆國大選舉過程中，及形塑選舉結果上，發揮了醒目但非關鍵性的作用。

表四：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of the Voting Decision in the 1991
National Assembly Election of Taiwan

解釋變數	模型一	模型二
intercept	5.7067 (1.8463)	3.2711 (0.7142)
政黨認同	-0.6788*** (0.1347)	-0.7084*** (0.1293)
政黨形象	-0.1094** (0.0370)	-0.1247*** (0.0352)
總統選舉方式	-0.2872* (0.1295)	-0.3226** (0.1227)
海外黑名單問題	-0.2298 (0.1324)	-0.2727* (0.1256)
教育程度	0.1423 (0.1157)	0.1850* (0.0764)
族群背景(大陸各省)	-0.2884 (0.5045)	0.0066 (0.4666)
統獨問題	0.0456 (0.1485)	
重返聯合國問題	-0.1702 (0.1698)	
憲與修憲問題	-0.0691 (0.1565)	
公民投票問題	-0.2052 (0.1418)	
中央政府體制問題	-0.1053 (0.1844)	
性別(女)	-0.3644 (0.2436)	
年齡	-0.0006 (0.0105)	
家庭經濟狀況	0.0556 (0.1564)	
N	598	695
-2LLR	202.963	240.043
DF	14	6
正確預測百分比	84.5	84.5

括弧內是標準誤 * $p < .05$ ** $p < .01$ *** $p < .001$

伍、誰較可能是議題取向的選民？

在二屆國大選舉中，誰較可能成為議題取向的選民(Issue Voters)？這是一個有趣且重要的問題，也是本文最後想處理的問題。表五和表六為我們探討這項問題提供了一個適當的基礎。基本上，我們的切入點是比較兩種選民的社會背景特質。這兩種選民就是根據知道或不知道選舉議題的存在做標準來劃分的。若完全不知道選舉議題的存在的話，這種人理論上是不可能成為議題取向的選民。至於對那些知道選舉議題的人，根據我們前述的分析，這類人只能說是有比較大的可能性成為議題取向的選民；也就是說，即使知道選舉議題的存在，也並不必然會依自己的政策偏好或議題立場來投票，因為影響個人投票決定的重要變數仍多。在測量的策略上，我們選擇了二屆國大選民最熟悉的兩個議題，統獨問題和總統選舉方式問題。在方法上則以最簡單的兩變項交叉分析法，嘗試去偵測出可能的議題取向選民。現且做一些最初步的分析如后。

根據表五和六我們可做以下幾點綜合分析。第一，從性別的角度看，知道選舉議題的男性選民遠超過女性選民。第二，年紀愈輕的選民愈熟悉選舉議題，年紀愈大的選民愈不了解選舉議題為何物，而且最年輕與最年長選民之間對議題的熟悉度極為懸殊。第三，從族群的角度看，外省籍選民知道選舉議題的比例最高，達九成左右；客家選民第二，閩南選民殿後。為何如此，值得玩味。第四，教育程度和是否知悉選舉議題的存在具有極顯著的關連。大專程度以上選民知道有統獨問題和總統選舉方式問題者，高達九成五，對照之下，未曾上小學的選民卻只有三成或不到三成的人知道這兩個問題的存在。第五，家庭經濟狀況和是否知悉選舉議題的存在亦具有極顯著的關連。家庭經濟狀況愈佳，愈可能知曉選舉議題的存在；反之，家庭經濟狀況愈糟，愈不可能知曉選舉議題的存在。貧富差距顯然影響選民對議題的認識。第六，有無政黨認同是判斷選民是否知曉選舉議題的良好指標。有政黨認同者，不論是認同那一個黨，比無政黨認同者更可能知道議題的存在，其間差距達百

分之三十。最後，國民黨與民進黨選民對選舉議題的熟悉程度，可說是不相上下。

總的來說，誰較可能成為議題取向的選民(Issue Voters)? 暫時性的答案是：年輕、高學歷、家庭經濟狀況良好、有政黨認同的男性選民。

表五：議題取向選民的社會背景特徵（關於總統選舉方式議題）

社會背景變數	知道 (%)	不知道 (%)	Chi-square	DF	N
性別					
男	78.73	21.27	52.40***	1	1380
女	60.91	39.09			
年齡					
30以下	83.74	16.26	148.60***	4	1380
30-39	80.95	19.05			
40-49	69.33	30.67			
50-59	57.14	42.86			
60以上	42.86	57.14			
族群背景					
本省閩南	67.67	32.33	24.74***	2	1368
本省客家	75.51	24.49			
大陸各省	87.05	12.95			
教育程度					
未曾上小學	24.38	75.62	351.65***	4	1380
小學	59.89	40.11			
初中	74.26	25.74			
高中/高職	89.11	10.89			
大專以上	94.87	5.13			
家庭經濟狀況					
貧寒	39.39	60.61	122.29***	4	1380
勉強	51.97	48.03			
平平	58.17	41.83			
小康	82.84	17.16			
富裕	78.48	21.52			
政黨認同					
有政黨認同者	84.47	15.53	143.95***	1	1362
無政黨認同者	54.76	45.24			
政黨支持者					
國民黨選民	74.79	25.21	0.807	1	972
民進黨選民	77.64	22.36			

*** p < .001

表六：議題取向選民的社會背景特徵（關於統獨議題）

社會背景變數	知道 (%)	不知道 (%)	Chi-square	DF	N
性別					
男	81.51	18.49	36.19***	1	1380
女	67.45	32.55			
年齡					
30以下	88.18	11.82	156.23***	4	1380
30-39	84.52	15.48			
40-49	74.11	25.89			
50-59	62.76	37.24			
60以上	47.71	52.29			
族群背景					
本省閩南	73.55	26.45	21.99***	2	1368
本省客家	72.08	27.92			
大陸各省	91.37	8.63			
教育程度					
未曾上小學	32.18	67.82	318.96***	4	1380
小 學	66.76	33.24			
初 中	79.66	20.34			
高中／高職	89.68	10.32			
大專以上	97.87	2.13			
家庭經濟狀況					
貧 寒	33.33	66.67	87.69***	4	1380
勉 強	64.57	35.43			
平 平	69.00	31.00			
小 康	84.58	15.42			
富 裕	61.73	38.27			
政黨認同					
有政黨認同者	86.84	13.16	115.52***	1	1362
無政黨認同者	61.56	38.44			
政黨支持者					
國民黨選民	79.92	20.08	0.564	1	973
民進黨選民	82.11	17.89			

*** = $p < .001$

陸、結 論

二屆國大選民的議題立場和其投票抉擇間的關係究竟是什麼？乃本文的中心關懷。為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更進一步地分析了幾個彼此關係密切的問題：有多少二屆國大選民認知到當時的六大熱門議題？有多少人在六大議題上持有立場並帶有強烈的關懷？又有多少人能認知到不同政黨及所選候選人在六大議題上的立場？選民的議題立場，相對於其他重要解釋變項而言，與投票抉擇間的關係強度究竟怎樣？最後，高比例的「議題大眾」(Issue Public)的主要社會背景特徵是什麼？在此我們願將主要的研究發現及其所代表的意義再做幾點綜合性的說明。

一、二屆國大選舉的主要議題絕大多數可視之為「簡單的議題」。

絕大多數選民在選前就已知悉這些問題的存在，因為這些問題從統獨問題開始個個都是臺灣政治上最敏感、最尖銳的問題。在過去嚴厲的戒嚴統治時期，這些問題是政治的禁忌，除了少數反對運動領袖和知識份子敢干冒大不諱向當局挑戰之外，人民不敢公開談論，深怕惹禍上身，但內心其實早已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存在，並暗中注意這些問題的發展。一旦政治自由化之後，言論思想的風險降低，當有更多的政治人物更勇於向禁忌挑戰時，大眾對現實政治的諸多疑慮與焦慮一時之間被解放出來，高比例選民知道主要選舉議題是什麼，只不過是台灣整體政治轉型現象的表徵之一而已。

二、客觀的經驗數據顯示高比例的二屆國大選民不但能認知到選舉議題的存在，同時也大都能對所關心的議題採取某種立場。

更值得注意的是，高達三成至四成的選民對六項重大議題皆表現出強烈的關心。這一切都說明了二屆國大選民不但不是政治冷漠的選民，而且是高度關心政治的選民。換言之，二屆國大選民中存在有為數可觀的、潛在的議

題取向選民。

三、二屆國大選民在區辨不同政黨及候選人議題立場的能力方面，也令人印象深刻。

有六成以上選民能清楚認識到國民黨與民進黨在統獨問題上的立場；有超過五成以上的選民能清楚知道兩黨主張用何種方式選舉總統（國民黨主張委任選舉，而民進黨主張公民直選）；在其他三議題方面如重返聯合國、制憲或修憲、海外黑名單等問題，清楚知道兩黨立場的選民從最低四成五到最高五成一不等，在在顯示二屆國大選民心理涉入政治之深。在選民對所選候選人議題立場的認知方面。一般選民對政黨議題立場認識程度遠超過對候選人議題立場的認知。換言之，為數可觀的選民儘管知道自己所選候選人所屬政黨的議題立場，但卻不知自己所選候選人所持的議題立場為何。然而，二屆國大選民對所選候選人議題立場的認知程度，從最高的四成六五到最低的兩成四，隨著議題的不同而變化。再度地，統獨問題仍高居第一，總統選舉方式其次，中央政府體制問題殿後。假如我們以候選人而非政黨為準，來判斷二屆國大選民中到底可能有多少屬議題取向的選民，我們或許可大膽地說：就是從四成六五到兩成四，隨著議題的不同而變化。這項數字明顯高於一九五〇年代的美國選民——從百分之十八到百分之三十六。

四、洛基迴歸分析結果顯示，二屆國大選舉是政黨認同和政黨形象因素主宰選局的一次選舉。

從選舉過程看，這次選舉的確是議題多且重要，同時有充分的證據顯示，二屆國大選民對這些重要選舉議題有相當的認識與關切，但卻只有總統選舉方式和海外黑名單這兩項議題對選民投票發生顯著影響，其他許多重大議題像統獨問題、制憲修憲問題等等竟然對選民投票影響力微乎其微。這項發現強有力的否定了民進黨二屆國大選舉係輸在「台獨黨綱」上的說法。的確，從現有的證據看，選舉議題在二屆國大選舉過程中，及形塑選舉結果上，發

揮了醒目但非關鍵性的作用。

五、假如說二屆國大選民中存在有高比例的「議題大眾」或「政策導向的選民」(Policy-motivated Voters)的話，那麼較可能成為這類選民的人的社會特徵是：越年輕、高學歷、家庭經濟狀況良好、有政黨認同的男性選民。

總的來說，基於對台灣選舉多年來的觀察與了解，我們認為二屆國大選民對選舉議題認識之深、反應之強，對兩主要政黨與候選人立場之清楚，以及存在有高比例的「議題大眾」等等現象，皆非偶然或獨特。同樣的現象應該也會表現在立委或更高層次的選舉中。個別選舉的特殊性誠然不能全盤抹煞，但台灣特殊歷史情境與結構性因素卻可能使各種主要選舉所呈現的風貌大同小異。高比例「議題大眾」等現象，很可能就是這類共同特徵之一。

最後，台灣的議題取向投票研究無論如何只是在起步階段，這塊園地需要有更多的園丁用更新更正確的方法去耕耘，因為這項研究主題有重大的實用價值和嚴肅的規範性意義，已如前述。本文只是這方面研究的一次大膽嘗試，疏漏之處定然不少。惟期盼能因而拋磚引玉，引起討論，則本文之目的達矣！

參考書目

中文書目

- 胡佛 1982 「政見取向的選民」，載：《近代中國的變遷與發展》。台北：時報出版公司。頁117-195。
- 胡佛、游盈隆 1983 「選民的投票取向：結構與類型的分析」，《政治學報》第十一期。
- 陳義彥、黃麗秋 1986 「選民政見取向的再探討」，《投票行與選舉文化》。中國政治學會編印，頁206-238。
- 陳義彥 1991 「政見與投票抉擇的關聯性—台北縣縣長選舉的探討」，雷飛龍等著，《台灣地區選民的投票行為——一個理論模式的探索》（未出版），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頁63-97。
- 游盈隆 1993 「當前台灣民意的特質與結構—二屆國大選民的分析」《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資料運用》學術研討會論文，中研院社科所與國科會合辦，南港，台北。1993年3月15-17日。
- 1993 「政黨形象、意識型態與台灣選舉變遷」，《政黨競爭與台灣民主化》學術研討會論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一日，南港，台北。

英文書目

- Berelson, Bernard R., Paul F. Lazarsfeld, and William N. McPhee. 1954. Voting: A Study of Opinion Formation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rody, Richard A., and Benjamin I. Page. 1972. "Comment: the Assessment of Policy Voting," APSR 66: 450-458.
- Campbell, Angus.,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Miller, and Donald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armines, Edward G., and James A. Stimson, 1980. "The Two Faces of Issue Voting," APSR 74: 78-91.
- , 1989. Issue Evolution: Ra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avis, Otto, Melvin Hinich and Peter Ordeshook, 1970. "An Expository Development of a Mathematical Model of the Electoral Process," APSR 64: 426-448.
- Downs, A.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Flanagan, Scott D., Shinsaku Kohei, Ichiro Miyake, Bradley M. Richardson, and Joji Watanuki. 1991. The Japanese Vot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Feldman, Stanley. 1982. "Economic Self-interest and Political Behavior," AJPS 26: 446-466.
- Fiorina, Morris. 1981. Retrospective Voting in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Kessel., John. 1972. "The Issues in Issue Voting," APSR 66: 459-465.
- Kinder, Donald R. and D. Roderick Kiewiet. 1981. "Sociotropic Politics," BJPS 11: 129-161.
- Kramer, Gerald H. 1983. "The Ecological Fallacy Revisited: Aggregate-versus Individual-level Findings on Economics and Elections, and Sociotropic Voting," APSR 77, 1: 92-111.
- Lazarsfeld, Paul., Bernard Berelson and Hazel Gaudet. 1944/1952. The People's Choice: How the Voter Makes Up His Mind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argolis, Michael. 1977. "From Confusion to Confusion: Issues and the American Voter," APSR 71: 31-43.
- Nieme, Richard G., and Herbert F. Weisberg. 1993. Controversies in Voting Behavior. Third Edition. CQ Press.
- Page, Benjamin I. 1978. Choices and Echoes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abinowitz, George and Stuart Macdonald. 1989. "A Directional Theory of Issue Voting," APSR 83, 1: 93-121.

Repass, David E. 1971. "Issue Salience and Party Choice," APSR 65: 389-400.

Riker, William H. and Peter Ordeshook. 1968. "A Theory of the Calculus of Voting." APSR 65: 25-42.

Sears, David O. Richard R. Lau, Tom R. Tyler and Harris M. Allen Jr. 1980. "Self-interest VS. Symbolic Politics in Policy Attitudes and Presidential Voting." APSR 74: 670-684.

附錄一

一、政黨認同的測量

本文對政黨認同的測量，是採用下列的題目：「目前國內有兩個主要的政黨，一個是國民黨，另一個是民進黨。請問在感情上您比較傾向接受那個政黨？(1)國民黨；(2)民進黨；(3)不偏向那一個政黨；(4)不知道；(5)其他。」假如受訪者回答國民黨或民進黨的話，就進一步追問傾向該政黨的度如何。在強度上分成三等。如此所建立的政黨認同變數是國民黨與民進黨各據一端的七等級強度變數。

二、政黨形象的測量

在我們一九九一的國大選舉問卷是採結構式和開放式兩種測量方式。在本文所使用政黨形象的資料是來自結構式問題的部份。針對國民黨與民進黨，我們分別設計了十道題來加以測量兩黨的形象。這十道題分別針對一個重要的問題層次：(1)台灣前途的立場；(2)政黨的代表性；(3)民主政治的改革；(4)人權保障；(5)貪污與腐化問題；(6)特權問題；(7)利益的代表；(8)執政能力；(9)政治改革；(10)政治競爭風格。我們相信透過這樣嚴密的政黨形象的測量，應能相當有助於了解政黨對選民的意義或選民眼中的政黨。

由於「政黨形象」有重要的理論地位，我們乃進一步嘗試建構「政黨形象指標」。在本文中建立了兩個政黨形象指標。一個是「國民黨形象指標」，另一個是「民進黨形象指標」。形象指標的建立分成三個步驟。首先，在十道題目中，只保留八道題目；被剔除的二道題目，分別是關於台灣前途的立場和政黨的代表性。理由是這兩道題目是比較中性的，認知性的題目，不像其他八道題目有較強烈的評價的味道。第二，對剩下的八道題，我們重新給分。以政黨形象的第三題來說：「民主政治的改革上：國民黨是推動民主的政黨，還是抗拒民主的政黨？」而除了推動或抗拒這兩個選項之外，還有其他三個選項：有時推動有時抗拒、不知道、其他。我們給分的標準如下表：

變數：民主政治的改革上	分數
推動民主	1
有時推動有時抗拒	0.5
不知道	0
抗拒民主	-1

簡單地說，明顯正面的評價給 1 分，有些正面有些負面的評價給 0.5 分，不知道給零分，明顯負面的評價給 -1 分。其他七道題的給分方式一樣。第三，結合八道政黨形象的題目分別建構成國民黨與民進黨形象指標。由於國民黨形象和民進黨形象分開測量，因此得到二種政黨形象指標。最後再將兩者合併構成一綜合性的「政黨形象指標」(Index of Party Image)。

The Issue Voting of Taiwanese Voter in the 1991 National Assembly Election

Ying-Lung You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ssue voting of Taiwanese voter in the 1991 National Assembly election. Based on a national election survey of 1991, I try to answer four main questions related to issue voting. These include: 1) How many voters were able to know the existence of this six salient campaign issues? 2) How many voters took positions on those major campaign issues and how strong were people concerned with them? 3) How many people realized the various issue positions taking by major parties and the candidates who they supported? 4) Comparing with other significant variables, to what extent did the issue attitudes of Taiwanese voter determine their partisan choice? Empirical findings suggest that issue positions constituted a major if not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decision of Taiwanese voter in this particular electi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are also discussed.